

# 探險須知：臺灣踏查經驗的傳承

張素玢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 摘要

本文爬梳探險、調查記錄與相關文獻書籍，探究清初、臺灣開港之後與日治初期「探險人士」在字裡行間留下的「探險須知」，使後人得以從各種型式的記錄當中得到踏查經驗的傳承；時距從清代跨到日治初期，對象則有漢人、西方人士與日本人。筆者的研究旨趣在瞭解各時代探險之士在臺灣進行踏查的準備工作和基本訊息的掌握。從本文的研究可知，背景相異的探險人士在不同的時空下，各有其資訊和人脈網絡，以蒐集必要的資訊並獲得協助，探險者留下的文獻記錄，不等程度地傳遞了具體心得和注意事項，這些「心得」或「須知」累積成探險知識系統的一環，後人從而得到踏查經驗的傳承。隨著時代變遷，臺灣交通條件改善，山區也有限度開放，「探險須知」遂逐漸轉化為「旅行指南」，踏查臺灣的性質已然不同。

關鍵字：探險、踏查、須知、資訊網絡、旅遊指南

## 壹、前言

20世紀以前，在臺灣進行調查，必須面臨自然環境的嚴苛挑戰以及強悍的原住民，具有相當的冒險性，因此19世紀的學者常用「學術探險」來表達其任務的艱難與特色。這些探險人士走入臺灣深山秘境，並留下多語言和圖像記錄，不同時空、民族的書寫，包括漢人、西方探險家及日本人，交織成臺灣自然與人文世界的光譜。探險家對自然、人文領域的探索與調查記錄，隨著新史料的挖掘與翻譯，對這些旅遊探險文獻的研究愈來愈受到重視。

與探險臺灣有關的文章、專書非常豐富，楊南郡譯注、整理日治時期重要學術探險的文獻，並以實地踏查的基礎加以補充；劉克襄有系統地處理西方探險、旅行臺灣的記事；吳永華則分別歸整植物、動物、鳥類等不同學門的學術探險成果，各出版了一系列的書籍。另外亦有各種專文討論探險、旅行文本中不同的觀看角度，以及描述主體、客體（我者／他者），或敘事觀點的呈現／再現等議題。

筆者除了史學研究以外，亦熱衷探索山林、海洋，每每從先驅者的記錄中，蒐集行前資訊、構思自己的探險地圖，從而激盪出這篇文章的研究動機。本文爬梳探險、調查記錄與相關文獻書籍，分析整理前人在字裡行間留下的「探險須知」，探究後人如何從這些文字當中傳承到踏查的經驗。時距從清代跨到日治中期，對象則有漢人、西方人士與日本人，史料運用以探險者留下的文字記錄為主，包括遊記、日記、稟啟、博物學家的自然誌與紀行、官員的復命書、調查報告等。

本文所謂的「探險」是指行動者為了探測新事物或是某特定目的，到當時不為人知或危險的地方去探索，官宦受隨扈行伍保護與安排的遊歷或巡視則不包括在內。本文指涉的「踏查」，意指實地探訪調查，而非透過文獻瞭解事物、景象；「心得」或「須知」是指「注意事項」，此為日治時期探險

或踏查記錄所使用之名詞，和中文的「心得」意思有所不同，清代或西方探險家並沒有特別在其紀行中歸納所謂的「須知」，筆者以其含意回溯清代之狀況，爬梳文字，以瞭解歷史變遷中探險臺灣的經驗傳承。

這些具有開拓性格的人物首次到陌生地遊歷、調查、探險，其探索行動存在相當危險性，卻多有突破性發展，但本文討論的重點不在呈現探險者的專業成就或成果，也不在分析探險者的觀點，而是回歸到各時代探險的共同基點，亦即探險的準備工作或基本訊息的掌握，探討這些探險者在他們活動的記錄中，傳遞了那些具體心得？提供了那些探險「須知」？探險人士又透過怎樣的網絡蒐集必要的資訊？這些探險「心得」或「須知」反應怎樣的時空環境？過去的經驗有何延續或斷裂？以上皆為本文探討的重點。

## 貳、採硫之行：清初漢人的探險經驗

自古人們從中土出關、出塞、出洋，除個人特殊目的或任務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識以外，最基礎的食、衣、住、行、氣候等參考資料都不可或缺。這些資料或來自口耳相傳，或親友相授，很難找到類似今日旅遊指南、手冊的文獻，只能從紀行、遊記中自行體會。而臺灣因自古不納入帝國版圖，又有海象凶險的海峽相隔，清代以前除了軍事目的外，未聞有來臺遊歷者。清代最早遊歷臺灣又留下記錄者為徐懷祖，他可能是來臺當遊幕之士，在其著作《臺灣隨筆》（康熙34年，1695）一書中描繪了渡海之險，<sup>1</sup>但對其餘行程著墨不多。

康熙35年（1696）福州火藥庫遇災，焚燬硫磺50餘萬斤。當時硫磺本採購自日本，因價格較高，應負其責的典守者無力購買，而臺灣已入清版圖，淡水產有硫磺，官差卻無人願到，仍被視為蠻荒之地、道路險阻的臺

---

1 徐懷祖，《臺灣隨筆》（康熙34年，1695年）（臺北：臺灣商務，1965-1966年）。

灣，幸有郁永河自願擔任這項危險任務。

郁永河，浙江仁和人，從康熙30年（1691）以來，已在福建遊遍八閩勝境，生性喜探險遊歷，對剛收入版圖、少有漢人行歷的臺灣深感好奇，卻苦於沒有機會至臺覽境。於是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渡臺採硫工作，剛好滿足郁永河的探險性格，因此，欣然就任這項艱難的任務，日後並寫成《裨海紀遊》（或稱《採硫日記》）。

有清一代，郁永河的採硫之行，可說最符合「探險」的性質，其特殊之處為：1、郁永河所到之處仍為漢人未闢之地：臺灣在康熙23年（1684）才收入版圖，設一府三縣，康熙37年（1698），臺灣北部屬諸羅縣所轄，而諸羅縣南北廣達919華里（1華里＝0.5公里），<sup>2</sup>郁永河到臺灣時大部分地方仍為荒蠻之境。2、郁永河非官宦身分，採硫雖為官方託付的任務，但行程路線、所需人力應為郁永河自行規劃，下榻地點也非官署、衙府。3、漢人第一次西部縱貫的行走路線：郁永河採硫之地為今日的北投山區磺坑，非一般行旅或漁、樵所至之處；從府治到淡水採硫的路線，也是漢人第一次留下的文字記錄。4、無畏艱險的個性：郁永河抵達臺灣後，郡守靳治揚、司馬齊體物、參軍尹復、守軍戚嘉燦等，都力勸他留在府治遠距指揮僕役即可，因為基隆淡水之地水土惡劣，一到即病，一病即死，連身強體健的官差都視之如絕域。<sup>3</sup>但郁永河在四位官軍的強烈勸阻之下，明知危險仍然決定親自前往。

儘管郁永河曾在福建5年遊遍八閩山川，但是橫渡裨海至蠻荒險境，為其生平第一次，到底他探險臺灣的知識經驗來自何處？

## 一、文獻

根據《裨海紀遊》所載，郁永河曾與呂姓友人共同參閱《臺灣府志》一書，他所參閱的《臺灣府志》不知為蔣毓英或高拱乾所撰之志？蔣志雖然在

---

2 周鍾瑄，《諸羅縣志》（1716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頁6。

3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叢書第1種（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年），頁11。

康熙24年（1685）完成初稿，但出版時間則應在康熙46年（1707）以後，<sup>4</sup>高拱乾則在康熙35年（1696）刊行，剛好是郁永河來臺前兩年，他可能有機會參考這本才出版的「新書」。

可是高拱乾編纂《臺灣府志》的用意在教化番黎、嚴整軍防、興利除弊、移風易俗等實際施政的問題，<sup>5</sup>對郁永河規劃行程路線、安排食宿的參考作用相當有限，不過這已是當時所能找到較全面的相關文獻，郁永河也或許從而建立臺灣的背景知識。

除了《臺灣府志》，郁永河亦翻閱了《輿圖》、《一統志》，<sup>6</sup>兩書雖然附載外夷之事頗多，臺灣卻一字未提；《明會典》「三保太監赤坎汲水」的記載，也語焉不詳，對他的採疏任務來說，參考價值不高。

## 二、舟師、友人的指點

郁永河離開廈門進入臺灣水道以後，就進入他不熟悉的「裨海」（意指小洋）；海上風向、針路、海象等等知識皆從舟師口中得知，他在航行過程且行且問，從而瞭解到「海上行舟，既畏風又畏無風」，海上「不得順風，寸尺為艱」，除了掌握航行針路以外，「風信」是海上行舟重要的條件之一。<sup>7</sup>

抵達臺灣之後，其任職臺灣的同鄉友人尹君、沈君勸他正視此行之危、之難、之險，應取消行程，但郁永河心意已決，自認有充分的規劃與準備，「不可以不往」。<sup>8</sup>他的同鄉阻擋不了，便為他調製備用藥，及贈送解毒去瘴癘的方劑。另有一同鄉黃君告訴他一項非常重要的訊息：

海舶不畏大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

4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頁28。

5 高拱乾，《臺灣府志》（1706），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首自序。

6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6。

7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3、5、8。

8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11。



有桅御風，有舵辟水，雖大風浪未易沈覆；若觸礁則沈，膠沙必碎，其敗立現。

黃君並嚴正告知，從郡治到基隆，船必須沿著海岸行駛，一旦遇到風險，沒有港可停泊，比在大洋行舟更加危險，如果有人要邀他取海路北行，他一定掉頭就走。郁永河謹遵受教，和友人顧君乘牛車上路，而另一友人王雲森，為圖方便不顧勸告登船啟程，從此分道揚鑣，命運南轅北轍。

17世紀末，郁永河將自身與其友人在陸路與海上歷險過程寫成的《裨海紀遊》，成為清代漢人探險臺灣的代表之作。其後，來臺旅行、遊歷並留下文獻者，主要為官宦、軍伍之士趁任職之便巡歷臺灣，他們事先已有官方行政系統支援，沿途受到妥善的照顧，實非「探險」。在郁永河之後的遊宦之士，已將《裨海紀遊》視為重要參考資料，例如康熙61年（1722）來臺的首任巡臺御使黃叔璥，將其廣泛蒐集的資料，包括地理、海防、島夷諸傳記、郡縣牒牘、來臺巡歷所見，在雍正2年（1724）寫成《臺海使槎錄》一書，其中摘錄多則《裨海紀遊》所記，<sup>9</sup>儘管黃叔璥之巡臺已受到官方鋪排，但是郁永河的親身經歷，不啻提供了臺灣在帝國治理之初的原始樣貌，可與黃叔璥的巡歷互相參照。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也引用郁永河所載的資料，可見清初以降郁永河的探險事蹟已藉由《裨海紀遊》流傳。<sup>10</sup>余志將郁永河列入卷十二人物志〈流寓〉、謝志將《裨海紀遊》收入卷六藝文志，連橫《臺灣通史》也將郁永河納入列傳，稱其遊歷臺灣的著作為「志臺灣者足取資焉」。<sup>11</sup>

臺灣割讓之後，中國人對臺灣文獻日漸生疏，但是郁永河在臺灣的探險經歷則受到日人的注意。方豪在校刊《裨海紀遊》時已梳理出日本人對《裨海紀遊》所下的功夫，包括研究郁永河探險經驗和成就、譯著、做為研究早

9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再版），頁2。

10 事實上在方志當中，也不乏旅遊記事，但為官宦、軍士履任值勤所見所思，和郁永河的探險性質有所不同。

11 連橫，〈列傳六〉，《臺灣通史》（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頁952。

期臺灣文化史的資料並加以校勘、作為小說題材等四類。<sup>12</sup>臺北帝國大學第一任總長幣原坦研究郁永河的探險經過和採硫過程，引用〈番境補遺〉來探討臺灣黃金、硫磺及石炭之探勘。<sup>13</sup>日人諸田維光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之邀來臺，他翻譯的臺灣地方文獻中也包括《裨海紀遊》，日譯書名為《南瀛遺珠：貳百歲年前之臺灣》，<sup>14</sup>諸田氏除翻譯註釋以外，還將他所能看到的各版本互相校訂，伊能嘉矩在日譯本序文中稱《裨海紀遊》在臺灣古史中價值最高，認為郁永河觀察縝密敘述詳細，其書與荷西文獻同樣對臺灣有考古學上的價值。

伊能氏在《臺灣蕃政志》第四篇卷下引《裨海紀遊》的記載，並歸納出郁永河的「理蕃方策」，<sup>15</sup>他也推崇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為「土俗研究之一有價值材料」，<sup>16</sup>伊能氏熟讀《裨海紀遊》，《臺灣文化志》、《巡臺日乘》中多所引用，踏查臺灣時常以郁永河的記載與自己所見相比照，可見郁永河的探險事蹟對伊能嘉矩有相當的參考作用。<sup>17</sup>臺灣總督府民政部通信局於1908年出版的《臺灣郵政史》，<sup>18</sup>不但徵引《裨海紀遊》一書，還附上郁永河行程路線圖，作為古今之對照。1895年抵臺，曾擔任臺中廳樟腦局局長的小西成章，曾反覆閱讀且謄寫《裨海紀遊》，他不顧山區險峻進行林業調查，自陳對郁永河的仰慕激發了他的冒險精神。<sup>19</sup>除了史料、譯著，作家西川滿更以郁永河《裨海紀遊》為題材，寫成小說《採硫記》。<sup>20</sup>

12 方豪，「序言」，（合校足本）《裨海紀遊》，頁8-11。

13 幣原坦，〈臺灣の黃金、硫黃石炭探檢に關する文獻內容〉，《愛書》，1（1933年），頁78-93。

14 諸田維光，《南瀛遺珠：貳百歲年前之臺灣》（臺北：古槐書院編輯局，1909年），頁33。

15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四篇卷下，頁58、64-67、71-72。

16 伊能嘉矩，〈臺灣に於ける土蕃の研究は如何程まで支那人の手によりて成就せられし乎〉，《東京人類學會》，14：157（1899年4月），頁271。

17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譯，《臺灣文化志》下卷（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書中引述《裨海紀遊》多達12處。

18 藤井恭敬著，《臺灣郵政史》（臺灣總督府通信局發行，1918年刊本）。

19 不著人，〈嗟小西成章氏（二） 郁永河を慕ふ〉，《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9月19日，第1版。

20 西川滿，《採硫記》分上中下三篇，發表於《文藝臺灣》，3：6（1942年3月），頁76-94、4：1（1942年4月），頁68-87、4：2（1942年5月），頁108-131。



戰後與郁永河同為杭州鄉里的方豪，究其心力考訂《裨海紀遊》各版本，並肯定該書的史料價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純青認為郁永河冒艱難歷險臺灣之作，為臺灣「古籍史料之權輿」，有啟發後來之效，因此於1950年刊行方豪校刊的《裨海紀遊》，是為臺灣叢書第一種，<sup>21</sup>乃研究臺灣史的重要史料。1990年代以降，郁永河的探險事蹟越來越受到一般人重視，不同的白話譯本相繼出現。<sup>22</sup>壯遊之風盛起後，年輕學子試圖追尋郁永河的探險足跡，儘管物換星移，時空不同，青年仍取法其精神，以單車「復刻」三百年前的壯遊。<sup>23</sup>郁永河在1698年到險阻多，水土惡，除流放者無人敢至的臺灣，其探險歷程在後代或經由文字書寫，或以行動重現，不同的世代用不同的方式承繼了郁永河的經驗和精神。

郁永河《裨海紀遊》儘管被清代官宦、日籍學者文人、戰後人士徵引參考或效仿，但是清末臺灣開港而來臺遊歷探險的西方人士，因文字的隔閡，郁永河的探險經驗可能未被參考，西方人士的知識來源有所不同。

### 參、重見「福爾摩沙」：開港後西人的探險經驗

大航海時代以降，西方人一直積極向外開闢新航路與貿易，地理位置的優越，使臺灣成為海權國家爭奪之地。1662年荷蘭人被逐出臺灣以後，西方文獻中的美麗島嶼福爾摩沙逐漸銷聲匿跡。1858、1860年的兩次英法聯軍，使清簽下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條約中要求臺灣開安平、淡水港。臺灣開港後，除了對外貿易迅速發展以外，豐富的生態與自然環境，更吸引不同

21 黃純青，「序」（合校足本）《裨海紀遊》，頁1。

22 坊間出版的各種有關裨海紀遊的版本或白話本包括，顏金良，《前進老臺灣：郁永河的採硫傳奇》（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年）。楊蘇之，《遇見三百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出版社，2004）。郁永河著、陸傳傑注，《裨海紀遊新注》（臺北市：大地地理，2001年）。郁永河著，許俊雅校譯，《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9年）。

2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單車社以「三百年騎郁記·跨越三百年的壯遊—追尋郁永河的足跡」獲選為2009年度青輔會青年壯遊臺灣計畫。

民族的人士到臺灣進行探險式的調查，他們將臺灣的動物、植物、生態以西方的自然科學理論和分類方法鑑定整理後，發表於世界各重要刊物。探險成果包括人文方面的原住民、社會、風俗，與自然領域的鳥類、動物、植物、地質、考古等，範圍甚廣。探險人士包括海關人員、博物學家、傳教士、外交人員，甚至水手、商人，由於其專業背景差異甚大，專注的主題各有不同，探險地點各異其趣，這些帶著探索未知地、懷著冒險心態的西方人，其記錄所透露的探險資訊相當多樣化。

多元而背景各異的探險者，對臺灣的瞭解主要來自17世紀以來西方人士的記錄，也有海員的輾轉傳聞，因此資料的正確度參差不齊。例如1884-1885年曾參與中法戰爭的法國水手Jean L.，他所聽到的臺灣是這樣的：

說到平埔番，他們是真正的野蠻人，不過並不兇，老愛釣魚。有人跟我說他們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迷信，比方說：可以走在刀片上不被割傷；神明的頭上長鹿角等，真是各有各的口味。野蠻的生番，他們像猴子一樣醜，不僅骨瘦如柴而且懶惰。有人說他們寧願兩三天不吃也不願去工作，根本就不像人。……

……野蠻的生番特別喜歡老鼠，而且會去捕捉它們來大快朵頤……。

……有人還說（不過我需要看到，不如說是聽到才會相信），一條名叫淡水的河，有會唱歌的魚<sup>24</sup>……

法國水手Jean L.所聽聞的19世紀末臺灣猶如處於蠻荒時代，但是英國駐淡水領事泰德（E. C. Taintor）不僅曾參考西方文獻，在其報告中甚至引用《噶瑪蘭廳志》、藍鼎元的《東征集》，這是一般西方旅行家甚少涉獵的。<sup>25</sup>大致說來，臺灣開港以後大部分的探險記錄或旅行記事，文字或圖片

24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Le mousse de l'Admiral Courbe*）（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年），頁31。

25 參考泰德Edward.C.Taintor,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June 18, 1874.

的描繪大致上比以前更精準，內容除了個人專業背景的知識性描述以外，也呈現相當實用，可供參考的資料。以下分析臺灣開港後西方探險者所提出的探險「叮嚀」。

### 一、隨行勞力

西方人探險家進行各種不同目的的探查時，攜帶的工具物品極多，雇用苦力挑夫是必要的，因此勞力雇用的問題成為他們關心的事項，勞力雇工有分平地和山區。

#### （一）平地

1883-1896年在臺灣教書的蘇格蘭教會宣教士伊德（George Ede又稱余饒理，1854-1908），雇用挑夫的經驗是，先與挑夫談好必須跟他到任何他想去的的地方並說明路線，以免中途苦力拒絕前進。<sup>26</sup>西方人發現臺灣苦力抽鴉片的情形很普遍，辛苦賺來的錢幾乎全部花在鴉片上，應盡量避免雇用這種苦力。1873年來臺的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有幾次曾雇用抽鴉片的苦力來當挑夫，儘管這些苦力外表看起來精壯耐操，卻因長期吸食鴉片，大都只剩下皮包骨，他也認為並不是理想的隨行勞力。<sup>27</sup>

#### （二）山區

西方人對臺灣的原住民有強烈的好奇心，甚至成為他們探險的一大誘因，即使深入山區充滿危險，也執意要突破種種困難，而探險旅行者進入山區所需的勞力又不一樣。臺灣邊區的土匪較為猖獗，又有「生番」出入，這時足夠對抗土匪或生番的隨行者和適當的武裝是必要的。漢人苦力挑夫大多

---

26 George Ede(1854-1908), "Journey to north Formosa", *The Prebyterian Messenger*(23 July 1886): pp.5-8; (6 August 1886): pp.6-9。伊德1883-1896年在臺教書、宣教。1886年1月18日他自臺灣府出發，途經斗南、鹿港、北斗、彰化、大社、草屯、埔社、日月潭、斗六、朴子、東石、鹽水港等地。

27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1842-1940）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48-49。

沒有武備，不願通過土匪、番人出沒之地，所以沿山探險的隨行勞力以熟番為主。1872年英國宣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 1841-1921）離開大社前往埔里社時，有58位熟番攜帶槍枝和長刀擔任他的保鏢。<sup>28</sup>

曾在1893、1894、1895年三度來臺的探險博物學家拉圖許（John David Dignes La Touche, 1861-1953），認為在福爾摩沙採集必須深入山區居住，土著的協助也絕對必要，這時就不能用中國助手與雇夫。<sup>29</sup>寶順洋行商人陶德（John Dodd）更建議找一、兩個番婦陪同，因為她們不僅可以背負物品，還可做通譯；陶德認為番婦是探險中最好的護照，只要探查的部落不是在戰爭中，有她們陪伴就會被視為無害的外來者。<sup>30</sup>以陶德的經驗，在山區叢林常有「野蠻人」一躍而出，盤問來者何人，答覆不慎可能就送上性命，番婦在這種危急的情形下極為重要。<sup>31</sup>

最深入臺灣深山的英國洋行職員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 1840-1907），曾夜闖未曾「歸順」過任何政權的「萬斗籠社」。必麒麟於1866年12月進行第三次南臺灣探險時，進入芒仔社和萬斗籠社，也在一位萬斗籠社老婦普麗桑（Pu-li-sang）帶領之下，一探深山峻谷中的神祕番社。<sup>32</sup>

## 二、交通工具

在臺灣鐵路未興築以前，平地的旅行沒有「大眾運輸工具」，清初以牛

28 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Sketches From Formosa*，林弘宣等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頁25。

29 戴勝，〈樹蛙・長毛象・原住民〉，收入劉克襄策劃、宋文薰等著，《探險家在臺灣》（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8年），頁91。

30 John Dodd, "A few ideas on the probably origin of the hill tribes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June 1882): pp.69-77; 10(December 1882): pp.195-203, 引自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年），頁238。

31 John Dodd, "A few ideas on the probably origin of the hill tribes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June 1882): pp.69-77; 10(December 1882): pp.195-203, 引自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頁238。

32 必麒麟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159-173。

車為主，中葉以後官宦、商賈多以轎子代步。對西方探險旅行者來說，轎子已經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如果騎馬或騎驢，只有自找麻煩。

英國牧師Canon Thomas McClatchie女兒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在她的遊記*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暫譯：異國風土記），對臺灣的轎子、轎夫有清楚的描述：

福爾摩沙沒有馬車，我們來往各地都需要乘坐兩人所抬的肩輿，它在早上開始營業，晚上就休息了。這種交通工具的兩側是由厚實的竹子吊起，並由苦力扛在肩頭上。一開始我感覺蠻不安全的，尤其在一條狹窄的田間小路被扛著走的時候，不過一下就習慣了。轎夫的脚步穩健，他們會抬著你走過光線陰晦的小巷卻讓你安心十足。在前面的轎夫總會有一盞色彩繽紛的燈籠跟著，有風時常常會吹熄燈籠，這時苦力會將你的椅子放在一個安全的角落，並想辦法把燈籠再點著。苦力抬轎時常常叫喊，因為這真的是艱辛的工作，尤其是在強風暴雨中！<sup>33</sup>

馬偕認為有時的確非靠轎子不可，轎子由兩名或四名苦力來抬，一天可以走上20哩路，但是被拘禁在轎子內，對任何一個喜愛風景及新鮮空氣的外國人來說，實在非常難受。<sup>34</sup>有的西方人一開始試著騎馬或驢踏上行程，但結果很慘，英國洋行雇請的萬醫生（Dr. P. Manson），1860年代在打狗郊區旅行時，因騎馬出遊而吃了苦頭。即使當時不是雨季，過溪時必須下馬換成短褲，自己先從平緩的水灘搭竹筏渡過，然後再換馬過溪。<sup>35</sup>

馬偕在回憶錄中也提到，為何他在臺灣不騎馬或驢，他分析如下：

---

33 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 P.33.（作者打字原稿，收藏於香港檔案管），本段文字由花譽書翻譯。

34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頁163。

35 劉克襄譯註，〈西方人在打狗的休閒生活〉，收入《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年），頁154。



- 1、臺灣的客棧或教堂沒有馬廄，官方也沒有照料馬、驢的規定。
- 2、沒有比較節省時間，因為驢、馬雖然較快，卻必須等扛著行李的苦力。
- 3、驢子不肯過橋、渡溪。

一位退休海關人員曾送了一匹驢子給馬偕，馬偕騎驢神氣地出行，學生興沖沖地跟著，他們走到一座不到3呎（約90公分）的窄木橋，橋下谷深約12-15呎，驢子到橋頭突然停住，兩腳前伸，兩耳後豎。馬偕與學生用盡各種可能，怎麼拉、怎麼推都沒用，驢子反使勁後踢並高聲嘶叫，結果浪費了一個半小時，從此，馬偕不再動過騎馬、騎驢的念頭。<sup>36</sup>

### 三、渡溪之險

臺灣的溪流屬荒溪型，旱季乾涸，雨季豐沛，甚至一天之內因暴雨驟降，溪流頓成危河，此時渡溪就成為非常危險的事。萬醫生曾經在渡溪時，馬匹突然陷入泥沙，幾乎消失在水面下，混亂中人、馬、槍和裝備幾乎全部變成「未來地質學家研究的標本」。<sup>37</sup>他警告說：千萬不要冒險騎馬渡河，河沙充滿危險，「絕無法承受一隻馬加上一個肥胖的英國人在上面」。<sup>38</sup>

馬偕在巡視各地教會時，主要以徒步方式，得翻山越嶺，一旦遇到山洪就很難通行。有時馬偕會讓苦力背過溪河，有時和學生、信徒，一手互牽，另一隻手握著竹竿渡溪。有一次傳教師連和（馬偕早期學生之一）的同伴滑倒被急流沖走，流到大轉彎的地方，才被岸上的兩個學生救起。<sup>39</sup>又有一次，馬偕和學生來到一條又寬又急的溪邊，看到對岸有船但沒有船伕，最後馬偕的學生游過河把船拖過來，打算自行渡划，卻被激流往下沖，船撞上水

36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164-165。

37 劉克襄譯註，〈西方人在打狗的休閒生活〉，《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155。

38 劉克襄譯註，〈西方人在打狗的休閒生活〉，《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臺灣東海岸的旅行》，頁154。

39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161、163。

壩而破成碎片。<sup>40</sup>

又如1872年英國長老會宣道士甘為霖在內社（今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完成教牧的任務後，被大雨困住無法過大安溪，來協助他的村民先在岸邊捆起又粗又長的繩子確保，並隨身攜帶約10呎長的堅固棍子。甘為霖繫緊遮陽帽，穿上破舊的防水衣，被兩個壯漢托著，其餘的壯漢圍繞在旁保護，一行人往溪中涉行，兩包隨身行李則由四個漢子負責運送。湍急的溪水使他幾乎無法站立，兩件行李被沖走，其中一件有大量乾燥植物，那是大英博物館的卡陸德（Carruthers）請甘為霖幫忙採集的臺灣高山植物，這些克服重重危難，且險阻費了相當大力氣才採集到的植物，卻在短短幾分鐘就消失無蹤了。<sup>41</sup>

因此，所有的探險者都一再提出行旅中要特別注意渡溪之險。

#### 四、裝備、必帶物品

19世紀的西方人喜歡穿著靴子旅行，但是山區常須渡溪，浸水之後的靴子又濕又重反而礙腳。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踏上探險之路以後，很快便發現像苦力那樣穿上草編的涼鞋是個好主意。草鞋又輕又透氣，行走在經常得涉過河流或小溪的山區特別好用，他還穿上長襪，這樣就不怕被草繩磨痛腳了。甘為霖往埔里探訪生番部落時，也覺得在行旅過程中經常要涉水，非常適合穿草鞋，既涼爽又方便。<sup>42</sup>史蒂瑞甚至學漢人穿上寬鬆的中式上衣和褲子，雖然大部分在中國的歐洲人都把它們當作睡衣來使用，但史蒂瑞認為更適合穿來跋山涉水。<sup>43</sup>

疾病問題是深入臺灣的一大挑戰，所以西方人通常被告知須帶足夠的藥品，尤其奎寧。臺灣雖屬亞熱帶地區，但無論是白天和夜間、平地與高山兩者之間的溫差都很大，一不小心即受寒，例如身強體壯的必麒麟，儘管歷險

40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鄭仰恩校注，《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163。

41 甘為霖著，林弘宣等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117。

42 Rev.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1913.

43 史蒂瑞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頁49。

闖入深山的萬斗籠社，卻因溫度變化過大染上赤痢，身邊又無藥物，只能拖著病體狼狽下山。相反的，出發之前帶足各種藥品的中國海關稅務司英國職員泰勒（George Taylor），1887年在南路旅行時，還可供應來索取退燒藥的士兵。<sup>44</sup>宣道士甘為霖則以奎寧及Liebig牌肉精，給患熱病的霧番頭目「阿列」服用而獲得其族人的接納。<sup>45</sup>一般而言，藥品不但可自救、救人，還是打開異族心防的關鍵。

### 五、禮物

藥品是打開心防的關鍵，禮物則可破除異族接觸的隔閡，不管面對的是漢人、熟番或生番，禮物絕不可缺少，除了事先準備以外，連西方探險者身上的物品、衣物都可能成為禮物，而且出自對方的主動要求。英國駐淡水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 1836-1877）在1862年造訪北部山區奎輝社時，把身上的紅色絲質腰帶當做禮物送給喜歡那條腰帶的少女，這位少女則以十字織的彩帶回報。<sup>46</sup>原住民有時強行索取他們想要的禮物，也讓探險者相當困擾。智巧的必麒麟觀察到當他希望從原住民換取一個精巧的煙斗或皮帶，而物主不願意時，便稱這件東西是「向」（Hiang），意為那件東西是「禁忌」的，不能片刻離身。他發現這個字很管用，只要番人糾纏著他要東西，特別是索取衣服上的鈕扣時，必麒麟立刻拿「向」當作擋箭牌，表示不能贈與。<sup>47</sup>

一般而言，只要是番人未見過的东西他們都很喜歡，例如針、木梳、打火石、鈕釦、鏡子、珠子、紅色法藍絨布、印花棉布、銅鍊、鑰匙，甚至火藥。禮物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可從甘為霖的一段文字充分了解：

44 劉克襄譯註，〈南路與後山——1887年探險家泰勒與十八灣社頭目潘文杰的旅行〉，《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東海岸的旅行》，頁97。

45 Rev. William Campbell, "Aboriginal Savages of Formosa", *Ocean Highways: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New Series* 1, 1874, pp.411-412.

46 R.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 Frederick Bell), 1863.8.

47 必麒麟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頁160。

……我們（甘為霖等）拿出了幾樣禮物來，包括一塊12碼長、顏色豐富的印花棉布，立即引起所有人的讚嘆與喜悅。這是一塊來自曼徹斯特最劣質的布料，上面有顯眼的花朵和漩渦的圖樣，然而，它卻在這些民眾心中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拘束都被拋開了，大家看著我，認定我也參與這塊美麗布料的製作過程。消息立刻傳開，說最厲害的巫師正來這裡，他們緊繃的情感終於紓解，下令立刻準備晚餐。<sup>48</sup>

受贈者拿到禮物以後，態度往往一百八十度改變，人際關係馬上疏通，甘為霖的切身經驗為一例證。

清末來臺探險旅行的西方人士，留下甚多的文字和影像紀錄，後人藉由這些著作指引，而能跟隨先行者的足跡踏查臺灣，受西方殖民主義與實證研究影響的日本人士，隨即更有目的性的接續了這一波的探險風潮。

#### 肆、學術探險：日人的踏查經驗

日人對臺灣的調查，早在1871年臺灣南部原住民殺害琉球民事件以後就展開，當日本決定出兵時，便派遣人員至臺灣各地調查，並編譯有關臺灣的中、西文獻，以及研究臺灣史地。日治時期日本基於統治需要，亟需進行各種調查，此一時期的踏查活動以「學術探險」為特色。

吳文星歸納日人對臺灣進行各種學術探險的原因如下：1、受西方先進殖民國家經驗之影響，在擴張殖民勢力之同時，每派遣學者先行前往擬殖民地或新殖民地，進行學術「探檢」。2、日本學界普遍認為臺灣之自然和人文亟待徹底調查，作為有效經營之資。3、應日本中央或臺灣當局之要求

---

48 這是甘為霖拜訪南部查里先部落（Tsarisen Tribe）時所碰到的情景。參見甘為霖著，林弘宣等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頁185。



做不同主題的調查。<sup>49</sup>

1896年末至1897年初，臺灣各地漸歸於平靜，總督府的施政方針與組織漸上軌道，伊能嘉矩奉命巡視全島蕃地，同行者有博物學者栗野傳之丞。在臺灣從事學術探險的日人，常彼此支援或交換心得，伊能負責調查蕃俗、蕃人事情、蕃語及歷史，栗野負責蕃地地理、生物、蕃人教育方針等相關事務。<sup>50</sup>1896年7月，東京帝國大學派鳥居龍藏到臺灣進行人類學調查，伊能嘉矩常給他意見，那一次的調查旅行中，剛好臺灣總督府民政局也派出了第一梯次的東海岸視察隊，鳥居與此一視察隊的田代<sup>51</sup>、成田<sup>52</sup>技師，坂<sup>53</sup>、阪基<sup>54</sup>技佐碰面，四位給了他很多指示，並提醒他各種應注意的事項。<sup>55</sup>

來臺的學術探險者，除了在報章、雜誌、學刊發表成果以外，也常以附錄、餘錄發表其調查「心得」，<sup>56</sup>這些注意事項非常務實，對後來的人相當有參考價值。1896年8月來臺的多田綱輔，<sup>57</sup>奉東京帝國大學之命進行動物調查，動物學會會員希望多田綱輔能詳加報導在臺灣調查過程中值得參考的資訊，於是多田氏在《動物學雜誌》分期報告他認為應注意的事項，包括行李搬運、言語、氣候、衣服、流行病、採集用具及藥品、土匪與生蕃、動

49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黃富三、古偉瀛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頁26-28。

50 梅陰子（伊能嘉矩），〈回想餘筆（一）〉，《雜誌記事綴帳》（1900年），頁9。

51 指田代安定。

52 指成田安輝，拓殖兼礦務課技師，根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查知。

53 不詳。

54 阪基氏，拓殖兼礦務課技手，根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查知。

55 鳥居龍藏，〈東部臺灣に於ける各蕃族及其分佈〉，《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2：136（1897年），引自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頁140。

56 日文漢字的「心得」有「須知」、「守則」之意。

57 多田綱輔為19世紀末日本動物學研究學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簡易科動物部。明治29年（1896）間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科各學科教室，因受帝國議會的經費補助，故派出許多職員與學生至各地蒐集研究資料，多田綱輔亦以理科學科動物學教室助手身分被派到臺灣進行調查工作，之後出版《臺灣鳥類一斑》一書。多田氏可說是在臺灣進行實地調查與動物採集的先驅學者，亦以先進科學方法製作臺灣動物標本並發表相關論文。多田綱輔個人資料參考，《臺灣鳥類一斑》（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899年），頁1-2。



物、協助者、健康、必備用品等方面。<sup>58</sup>（見附錄一）

多田氏對他調查的宜蘭地區看法是：土匪出沒，無法在山區探險；無餐宿，連警官也幫不了忙。<sup>59</sup>10、11月是雨季，海路、陸路交通皆不便，冬季海象險惡，<sup>60</sup>所以在宜蘭與臺灣東岸地區踏查，要慎選季節，10月開始氣候不穩定，溫差也大，雨量增多，河水時而氾濫，陸上踏查甚為困難，海上調查也無法進行，5月至9月才是最好的時間。<sup>61</sup>

除了鉅細靡遺的「心得」外，多田氏還不厭其煩的列出他到臺灣攜帶的全部物品，以及運送、採集器具物品的諸多心得。從多田氏列舉的心得，可看出他探險注重細節與檢視所有裝備的習慣。

和多田綱輔同年10月來臺的山崎直方，<sup>62</sup>奉日本官方相關單位之命，隨同小藤理學博士<sup>63</sup>進行地質調查，他也是日治時期學術探險的先驅之一，其調查地區與多田綱輔不同，也比多田氏更深入山區，因此他親身經歷所提出的心得和多田氏不相重複，涵蓋住宿、標本托運、行李、道路狀況、山區狀況、風土病、氣候、鞋子、語言等問題。<sup>64</sup>（見附錄二）

---

58 多田綱輔，〈臺灣探檢旅行餘錄〉，《動物學雜誌》，10：111（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8年），頁17-18。

59 多田綱輔，〈臺灣通信（其二）〉，《動物學雜誌》，8：98（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6年），頁475。

60 多田綱輔，〈臺灣通信（其三）〉，《動物學雜誌》，8：99（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7年），頁26。

61 多田綱輔，〈臺灣通信（其三）〉，《動物學雜誌》，8：99（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7年），頁69。

62 山崎直方（1870-1929年）是日本的地理學家，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地質學科。山崎氏著述頗多，死後相關著作合訂成《山崎直方論文集》一書出版，內容涵蓋其畢生對於火山地形、地質、岩石、礦物及冰河地形的研究成果，對於地形學、人文地理學的發展頗具貢獻。山崎直方個人資料參考〈新刊紹介〉，《臺灣教育》，344（臺北：臺灣教育會，1931年3月），頁143。

63 小藤文次郎為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地質學博士，明治29年10月受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補助，到臺灣進行地質與動物相關調查。小藤文次郎資料參考〈小藤大學教授〉，《臺灣日日新報》，44號，二版，1896年10月24日。

64 山崎直方，〈臺灣探檢餘談〉，《地質學雜誌》，4：41（東京：日本地質學會，1897年），頁191-193。

1895年12月來臺調查礦物的石井八万次郎，<sup>65</sup>將1896-97兩年來的經歷揭載以供他人參考，石井氏提出的探險須知，不但詳盡，並將探險歷程中的獨特心得一一陳述，可說是日治初期進入臺灣山區的「寶典」，他歸納的探險經驗包括踏查路線、自我防衛、食物藥品、苦力的雇用、語言、保健、甚至打包行李的方法等，還獨創一種「人數遞減法」來調配隨行人員。他認為旅行人數的精算很重要，10人以上的隊伍協同者會超過20位，日本人太多將驚動蕃人，進入蕃社尋求食物也有困難，若想備齊所有成員的食物，搬運人力相對增加造成許多不便。最好仔細挑選5位成員，外加3名挑夫，這是一個隊伍人數的最上限。所謂「人數遞減法」，亦即一開始先派多人搬運大量物品包括贈送蕃人的禮物，這樣可確保回程不受蕃害，之後隨著物品與食物漸減，陸續讓挑夫回去，最後剩下5、6人繼續前進即可。石井八万次郎行經丹大山時就用「人數遞減法」，他與兩名日本挑夫、中國通事一名共4人，一同由埔里社前往臺東，預計行程要12日，結果抵達臺東時只費9天，顯示這種方法非常成功。

除了衣食住行等應注意的事項以外，石井氏特別叮嚀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

要把支那人與蕃人視作下等人民，有時溫和、有時嚴肅，不可讓兩者間互通消息。盡可能的保持禮貌與和善，輕率的舉動會招致侮辱，憐憫老人、疼愛小孩的舉動最能傳達關愛，為病人施藥治療之後，會受到熱情招待。切忌戲弄婦女或太靠近她們，特別是在蕃界，不然可能會引發大爭端。贈送金錢或禮品時只拿出所需的部

65 石井八万次郎為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士，日本治臺之初即來到臺灣，在臺灣總督府內擔任商工課員的職務，明治28年12月時奉殖產部長之命曾至基隆支廳內進行礦業調查。明治31年任職於民政局殖產課期間，編纂《臺灣地質礦產圖及說明書》一書，礦產圖以鮮明的色彩區分各個地質礦產區；說明書中則有序言、總說、岩石論、地質構造篇、礦產篇及附錄等內容，此為進行全島踏查後的調查資料彙整，頗具有參考價值。石井八万次郎個人資料參考，〈雇員石井八万次郎外三名出張ノ件殖產部長上申〉，《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28年（1895年），永久保存，第5卷46冊（1895年12月22日）、〈臺灣地質礦產圖及說明書〉、《臺灣日日新報》，12號，二版，1898年5月19日。

分，不可讓人知道有多少財物或贈品，否則一旦對方起了貪念，將會招來意外禍害。日本人對中國人尤其傲慢自大，使對方有被輕蔑的感覺，對待挑夫特別有這種現象，應更加謹慎。<sup>66</sup>

石井八万次郎在進行地質礦物調查的兩年之間，跑遍臺灣各地，遇過各種狀況，所以他列舉的探險須知，洋洋大觀，鉅細靡遺，不只針對地理、地質專業者，對一般人在臺灣踏查旅行都非常受用，尤其深入山地的種種細節皆提供具體的指引。這些看似繁瑣卻非常實用的探險基礎知識，透過文章的發表快速累積，成為學術探險的標竿者，也逐漸歸納出自己的探險原則。

日治初期踏查成果相當突出的伊能嘉矩認為，進行蕃地探險有三個必須條件：第一、了解蕃地的相關知識；第二、對待蕃人須見機行事；第三、對於蕃語至少要有一定的了解。<sup>67</sup>他也在〈南遊日乘〉的序頁，寫下「踏查三原則」，這是他自從來臺灣以後，一直身體力行、遵循不悖的座右銘：

- 1、即使生病或有其他事故，當天查察的事情必須當天整理完畢。
- 2、為達到科學查察的目的，其要訣在於「注意周到」四個字。日後撰文時，如果還有細微不明之處或疑點，就是當初犯了注意不周的問題。
- 3、以周詳查察的結果，必須以同樣周到的筆法記述。<sup>68</sup>

另外，在人類學探險成就極高的鳥居龍藏，無論在何處調查都依照他所確立的諸多準則而行：

- 1、為了爭取時效，並有效達成目標，出發前夕請國內有力人士寫介紹信，持此信函往目的地。
- 2、每到一個地方，先向當地頭目做禮貌性拜訪，可以獲得意想不到的方便。

66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島地質礦產圖說明書》〈附錄〉（臺北：同編者，1898年），頁180-197。

67 梅陰子（伊能嘉矩），〈回想餘筆（一）〉，《雜誌記事綴帳》（1900年），頁8。

68 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註，《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頁15。

- 3、每到一個地方調查，先參觀當地博物館的出土文物。
- 4、訪問當地的民間學者或熟悉民間掌故者，可以獲取有力線索。
- 5、每到一個地方調查的同時，搜購或抄寫舊書，也購買當地新出版的書籍。
- 6、攜帶相關的權威性著作及參考資料到現地參考並印證。
- 7、住進地方酋長或土著頭目的家，可以獲得種種資料與交通工具的安排。
- 8、雇用譯員時，優先採用懂得地理與地方掌故的嚮導擔任。
- 9、利用駐紮當地的駐軍或官署宿舍，可以解決食宿、交通與安全護衛問題。
- 10、利用官署派員出差執行公務的機會，與他們同時出發，使用同樣的交通工具、譯員或挑夫。<sup>69</sup>

臺灣總督府成立後，在民政局中設內務、殖產、財物、學務等部，各部為了調查、設置之需，聘請專家、學者，以囑託、雇員、技手、技師等職位參加總督府的工作。<sup>70</sup>日治初期統治勢力未達的蕃地，即使這些專業人才官方託以重責，事實上連軍方、警方都不能保證執行調查的安全，於是這些學者的任務有如探險，必須小心翼翼地進行每一步驟，以免費盡心血與體力來蒐集的資料，因任何的疏忽而功虧一簣。

---

69 鳥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頁30。

70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頁28。

## 伍、探險網絡

### 一、清代郁永河

1698年郁永河抵達臺之際，臺灣才收入清版圖一年，能蒐集到的文字資料幫助不大，他又非正式官員，其資訊網絡非常單薄，主要是郁永河在臺任職的同鄉友人。其友人尹君、沈君為郁永河調製用藥、解毒方劑，另一同鄉黃君則嚴正告知，從郡治到基隆務必循陸路北上，大洋行舟非常危險。由於事先能閱讀詢問的來源有限，在臺灣的同鄉人士也不多，郁永河一路且行且問，從舟師口中初解渡航之事，由社人口中知悉地方風土，在客居之所知得前行路況，隨行土番為之「問水」<sup>71</sup>涉渡，郁永河就從這些現地網絡從而建立起自己的「資料庫」。

郁永河可能是清代最早縱貫臺灣南北且留下完整記錄的漢人，在臺少數鄉里人士構成郁永河的經驗網絡，其有限性與薄弱程度，大大提高了他的探險指數，而成為歷險臺灣的經典人物，其著作《裨海紀遊》所記錄的探險經驗，亦為清代渡臺官宦的最佳參考資料。

### 二、西方人士

西方人士從地球的彼端來到陌生的島嶼探險旅遊，不同的語言族群、險峻的山區、多變的氣候、地方性傳染病，以及最基本的食宿交通，都有待克服。究竟西方探險旅行者，除了事先閱讀相關文獻資料以外，還能透過何種機制解決上述問題？我們無法非常具體了解每一位探險者背後的人際、資訊網絡，只能從若干記錄中抽絲剝繭，加以推知。

以美國博物學家史蒂瑞來說，他在1873年從秘魯出發，航行至東方，想物色一個適合探險、收集自然史博物的地方，最後決定走訪福爾摩沙，

---

71 「問水」意指渡溪時試探溪水的深淺。



原先他只想到比較開發的地區，沒想到竟進入山區深入調查原住民部落。<sup>72</sup> 史蒂瑞先在廣州取得寫給臺灣外國商人及宣教士的介紹信，又在廈門得到美國駐廈門領事韓德森（Mr. Henderson）提供一切協助。韓德森幫忙史蒂瑞向中國官方申請旅行證照，並承諾如果史蒂瑞在福爾摩沙被野蠻人獵頭，「他必定會召集美國砲艦來修理這些野蠻人」。<sup>73</sup> 史蒂瑞在臺灣期間（1873-74），得到的協助包括廣州的美國商人奈伊（Mr. Gideon Nye），他幫忙蒐集所有關於臺灣的資訊；臺灣方面則包括英國駐福爾摩沙領事葛雷哥立（Mr. Gregory）、英國基督教長老會李麻牧師（Rev. Ritchie）、甘為霖牧師（Rev. Campbell）和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馬偕牧師（Rev. Mackay）等人。<sup>74</sup>

教會人士本身有一完善而開放的支援網絡，也就是不只對教會人士，只要有需要幫助的西方人，大多能獲得教會相關的諮詢或住宿、嚮導的安排。南部與北部相比，南部因英國基督教長老會的傳教系統在1865年以後陸續建立，北部的加拿大基督教系統則要到1872年以後，所以探險旅行者在南部往往有比較完整的網絡，能借宿教會或由宣教士提供各種協助。馬偕剛到北臺灣時，雖能得到一些奧援，但多半仍要自闢傳教之路與忍受非常骯髒簡陋的客棧（販仔間）。

除了教會，駐臺外籍官方單位，主要為領事、海關系統、在臺洋商，皆願意協助探險者。例如必麒麟得到任職公司「天利行」的老闆鼓勵，出借好馬與僕役助他深入山地。必麒麟想探訪原住民部落時，也曾徵詢道明會神父，雖然神父大力反對，但還是為必麒麟找了一個老平埔族人當嚮導。反之，傳教士也會搭配探險者的計畫，進入教義未達的山區，試行傳教的可能。史蒂瑞於1873年10月至次年3月間來臺進行調查旅行間，曾由甘為霖和英國領事布洛克（Bullock）陪同，從南部一路北上，最後隻身抵達淡水，拜訪馬偕。

72 Joseph Beal Steere, "Prefac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2年)。

73 Joseph Beal Steere, "Prefac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p.17.

74 Joseph Beal Steere, "Preface",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 .

馬偕在回憶錄中提到在中國或日本的城鎮、港口，宣教師和外國人之間都存在著嚴重的裂痕，宣教師常常抱怨中、日的外國人對基督教的宣教事業不聞不問，甚至外國人社團對於宣教師及宣教工作公然或暗地的輕視。另一方面，宣教師則暗指商人俗氣、軍人生活放蕩、領事們缺乏同情心且無靈性，而外國遊客則心存偏見、四處遊蕩，他們的出現，只給予宣教不利的影響。但馬偕認為臺灣的情形不同，他一再提及歐洲及美國商人、領事、海關人員、醫師等，對教會非常友善，且願意為他們服務；像德記洋行、和記洋行、德忌利洋行等，領事及海關人員等，都是教會的好朋友。<sup>75</sup>

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因南北之間沒有海運直接聯繫，而陸上往來既困難又危險，兩者相遇就好像「夜間駛過的船隻，在擦身而過時互相交談一下」。儘管如此，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的宣教士有機會仍互相支援。甘為霖曾和馬偕一起到內陸的鄉鎮地區傳福音，幾年之後甘為霖繞道噶瑪蘭平原，第二次來訪問馬偕。1875年，李庥牧師到淡水，馬偕等共九位傳道者陪他70天巡訪馬偕所有的佈道站，然後向南走，越過山嶺、沙地、叢林及懸崖，最後抵達南臺灣宣教區的最北佈道站。<sup>76</sup>

19世紀在臺灣的西方人士，不管其身分為傳教士、醫生、商人、官員或船員，都積極尋找機會在福爾摩沙進行探索，於是教會、駐臺單位、洋商等西方社群，交織成19世紀探險臺灣的網絡，這樣的網絡更促成西方人士達成各種探險的可能。

### 三、日本人士

受臺灣總督府之聘來臺的日本人士多有其專業背景，執行官方賦予的任務，所以儘管個人領域不同，探險的目標相異，但是探險執行面的整齊度較高，支援網絡也較完善。日治時期的探險網絡主要由官方、學界構成，官方又以臺灣總督府為樞紐，動員行政單位的警察體系、地方行政系統，再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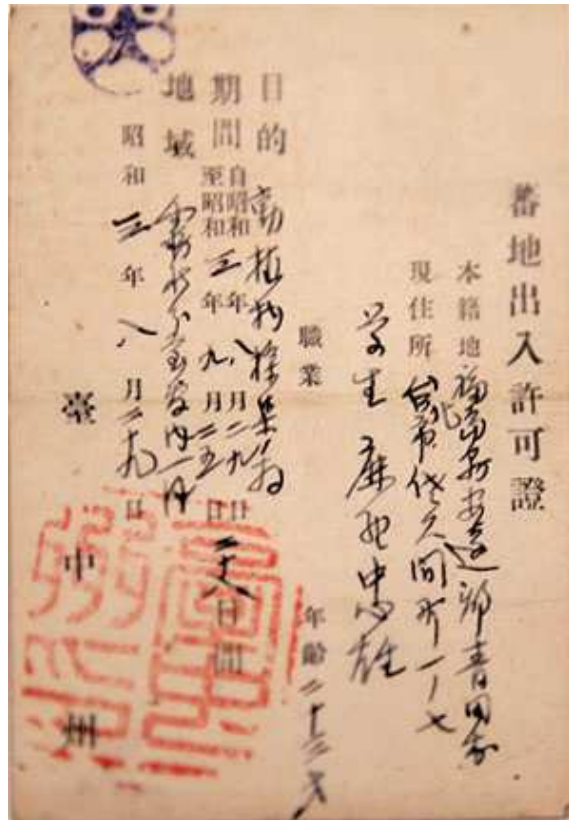
---

75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3-308。

76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頁315。

行政系統動員民間資源。當日本的殖民統治愈趨嚴整，國家控制愈嚴密，踏查人員的安全也受到更多保障。

日治時期進入蕃地需辦理「入蕃許可」，蕃地事務由警察管理。各州知事管轄下有警務課，其中有理蕃係。中央的總督府設警務局，其下有理蕃課，總管臺灣蕃地行政。由於山地警察必須學習駐在地區的蕃語，所以也常成為調查者的翻譯。1928年宮本延人隨移川教授進入太魯閣社，也是經由大學當局報備調查計畫給花蓮港廳長，並請予以協助相關事宜之後，才得以進入山地。移川與宮本在中途的派出



鹿野忠雄的「蕃地出入許可證」（1928.3.29）  
（現存於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李彥旻攝）

所過了一夜，居住深山遠離人群的警察少有機會跟外界來往，外來的學者經常是受歡迎的，他們也透過行政單位的關係為以後的調查工作做準備。<sup>77</sup>

1900年以前，學術探險最感不便的交通、郵遞、衛生、治安等問題，隨著各項建設陸續完成，大大降低探險的困難。1900年代以後臺灣各地普設郵局，訊息傳遞、標本寄送更方便；1908年縱貫鐵路完工，城鄉之間道路持續修築，對轎子、挑夫、苦力的依賴減少；公共衛生與醫療有效地防治風土病與傳染病，旅社、飲食店逐漸增加，在在滿足平地踏查行旅中的基本需求。當日本的殖民統治愈趨嚴整，國家控制愈嚴密，如蜘蛛網般的隘勇線、重要節點的駐在所，使深入蕃界踏查人員的安全也受到更多保障。

77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編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1998年），頁30、34。

不只是探險人員的風險降低，便利性提高，在鐵道縱貫線正式通車後，臺灣旅遊「案內」（指南）、名勝、寫真帖和遊記紛紛出現，介紹鐵路沿線風景、餐宿、費用等資訊。登山活動甚至也有條件的開放給一般大眾，1913年日本官吏發起的臺灣登山會成立，1927年由臺灣總督府文書課臺灣山嶽會出版，〈新高登山のしをり〉呼應當時方興未艾的登新高山活動，說明「登新高山心得」：

- 1、進入蕃地須許可證，應預先向相關單位辦理入山手續。
- 2、即使是盛夏，也請攜帶冬衣。
- 3、請攜帶乾糧。
- 4、請在集集準備食糧。
- 5、請在水裡坑備齊草鞋與人夫。
- 6、在駐在所過夜時，即使不舒服也務必忍耐。
- 7、住宿費務必確實繳付。
- 8、對於蕃人的敬禮與打招呼須有禮貌的接受。
- 9、請勿戲弄蕃人。
- 10、教導蕃人良善的事情。
- 11、請準備急救用品。<sup>78</sup>

由臺灣山嶽會的設立和這份總督府文書課提供的「登新高山心得」可知，臺灣山岳不再全是「黑色」地帶，踏查臺灣已漸漸脫離探險的性質，人們可以有條件的進入山區，攀登臺灣最高峰。1936年臺灣總督府頒行臺灣國立公園法，進一步推動著名山岳的延伸景點，並發行各種旅行「案內」。旅行案內亦即旅行指南，通常書中先對臺灣做一簡介，再依次介紹臺灣旅行「須知事項」、交通狀況、各地風景名勝、鐵道旅遊指南等實用資訊。<sup>79</sup>有心從事旅行或山岳攀登者，很容易從「案內」、「心得」中，找尋適合自己

---

78 臺灣總督府文書課臺灣山嶽會編，〈新高登山のしをり〉（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書課，1927年），頁1。

79 參考武澤贊太郎，《臺灣旅行案內》（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8年）。



體力、時間、興趣的行程資料，卻也無形中被規範出較制式的踏查旅行模式，已失20世紀以前，探險先驅自行摸索、自己開闢探險之路的況味。

### 陸、結語

15世紀大航海時代一直到18世紀，西方世界逐漸塑造出一種探險的文化精神或價值觀，使得東西方的發展產生戲劇上的變化，探險活動的表現成為國力乃至世界影響力的象徵，也逐漸影響了東西方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西方人初踏上臺灣的土地，不管荷蘭、西班牙時期或19世紀後半，總汲汲進行探險。反觀清代在臺灣的探險事蹟卻如鴻毛麟爪，郁永河的採硫之旅為偶發事件，為探險而探險的例子幾乎絕無僅有。1895-1945年日本為統治臺灣全面進行各種調查，學者陸續來臺，造成另一波的探險高峰。

清初，官民對臺灣的瞭解非常有限，郁永河能參考的文獻資料不多，所有的訊息都顯示採硫任務極端艱難危險，若非他的探險性格，今日恐難有「裨海紀遊」留存。郁永河抵臺，採硫行動才一步一步落實，他的探險資訊網絡為其在臺灣之同鄉，同鄉之人諄諄告知行路須知、風險所在，備製藥丸，其餘不可預知的險阻，靠郁永河自行面對，並在行路中汲取經驗和知識。

1860年代來到臺灣的西方人，其經驗的傳承除了西文文獻亦有少數參考清代方志。這些身分不同、目標各異的西方探險者，充滿個人色彩，他們的諮詢網絡由教會、駐臺單位、洋商等西方社群交織而成，教會則是探險網絡的重要節點。西方人在其探險記錄、遊記中，多少述及探險臺灣應注意的事項，但是探險心得與須知，卻不是必要的記載內容。「心得」與「須知」成為探險知識系統的一環，要到19世紀末日本人來臺踏查以後。

日治時期的踏查探險活動，其軸心為臺灣總督府，配合者為學界，其主要目的為殖民統治之需。儘管調查目的有其政治性，卻不失其學術本質，



於是政治力量成為學術探險的最佳協同者，官方行政系統與學界人士，構築出綿密的探險網絡。此外，探險者也樂於或自覺有責任傳承探險的經驗，因此在其研究報告、遊記、復命書中，以附錄、餘錄的型態，非常細緻地將探險心得加以條列陳述，使後來者可參考這些心得或須知，掌握踏查的基礎資訊。

曾被外來學者稱為「黑暗之地」的福爾摩沙，就靠探險先驅在荊棘叢林中開闢出一條路徑，而探險須知便是鋪成這些路徑的每一塊踏腳石，讓後來的人們循著先驅者的腳步踏查臺灣，這些先行者的經驗與歷程，今日更轉化為一種探險精神的傳遞，激勵不同世代以自己的方式成就自己的探險之路。

## 附錄一

多田綱輔探險心得發表於〈臺灣探檢旅行餘錄〉，《動物學雜誌》10：111（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8），頁17-18。

- 一、行李搬運：主要仰賴苦力，費用每人每里25-30錢左右；此外尚有轎子，貨物搬運費用是日本內地的數倍以上。
- 二、言語：在日本人聚居地，臺灣人多少懂日語，但越遠離都市言語越不通，進行學術調查時便容易有遺憾。雇通譯很困難，只能依賴稍會臺灣話的人翻譯，所以調查之前，先練習臺灣普通用語十分重要。
- 三、氣候：南、北差異大，臺北與基隆也有差異，北部6、7月最熱時溫度往往高達華氏百度以上（約攝氏37.7度），到10月時溫度還是比東京一帶熱。南部在冬季穿夏服也可以。
- 四、衣服：冬夏皆適宜穿「法蘭絨」，但因商品多不流通，價錢也不便宜，所以應先在日本製作合適的衣物。另外，務必要攜帶雨具、油紙等物。
- 五、流行病：特別的流行病為「瘧疾」，預防方法是穿著乾爽的衣物，夜間則特別以衣物包住腹部，注意保暖。
- 六、採集用具及藥品：盡量在當地找採集的用具，藥品也可取得，只是價格非常昂貴，所以藥品盡量在日本購買，並自行攜帶。
- 七、土匪與生蕃：土匪行蹤神出鬼沒，若不能儘速討伐，臺灣的踏查工作就沒有太大希望。生蕃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對地理環境不了解，就無法單獨進行蕃地踏查。
- 八、臺北附近的動物：臺北附近數里間的地勢平坦，四周被山脈所環繞，實際調查後發現，許多鳥類、昆蟲類是日本所沒有的。
- 九、協助者：土匪尚未平定，因此旅行也不太安全，若想得到官方幫助調查者，可向陸軍軍務局、學務課及殖產部提出申請。
- 十、住宿問題：旅社不多，若無旅社時可求助警察派出所，不然就去當

地「總理」家商借住一晚。

- 十一、健康：與日本相較，臺灣是個極不衛生的地方，也因此渡臺者應該詳知此地的地質與氣候，最重要的是一定要非常注意衛生，尤其臺灣十分流行瘧疾。有關瘧疾的預防方式：第一、不要生食，臺灣水質多半不良；第二、應穿著法蘭絨製成的衣物來抵禦濕氣；第三、注意夜間的保暖工作，因為感冒也是導致罹患瘧疾的原因之一；第四、在旅途中每日都要服用定量的奎寧；第五、河水或雨露弄濕身體時常令瘧疾有機可趁，要注意。
- 十二、必備物品：炊具、罐頭一定要帶，雞、蛋、米等在當地購買。在山野跋涉之際，應隨身攜帶消毒藥膏等藥品，拔草務必戴手套，毛布、雨衣、蚊帳都是必備物品。

## 附錄二

山崎直方探險心得發表於〈臺灣探檢餘談〉，《地質學雜誌》4：41（東京：日本地質學會，1897），頁191-193。

- 一、住宿問題：臺灣主要的驛站都有內地人開的簡陋旅店，荒僻之地只能借宿臺灣人住家或蕃屋，因此務必攜帶毛毯及食品。
- 二、標本托運：旅途中常找不到託運的地方，只能帶在身上，直到有郵局。
- 三、行李：比內地帶的要更多，處理更費事。市街上苦力（擔夫）容易尋得，但與之約定時間難。越荒僻之地苦力越少，尤其不願沿著蕃界行進，得出更多傭金。
- 四、道路狀況：主要為軍道。臺中、臺南等平原，平坦如日本國道，其他道路都是田間小徑，山路十分崎嶇急峻。河流少見橋樑，得涉水，過河須多方嘗試，水深大致及膝，深山茅草茂密，高度約身高兩倍以上。
- 五、山區狀況：老樹纏繞，古藤蔓草，蘭科、羊齒科植物叢生，到處有

蘆草與藤，是生蕃重要的交易品，森林只有蕃人能自由出入。

六、風土病：是臺灣旅行最可怕的事，最出名的風土病為瘧疾，瘧原蟲透過水而侵入人體，因此生水與未經煮熟的食物皆不可入口。另外，山中溫差極大，加上旅程疲累，都是導致罹患瘧疾的原因。

七、氣候：以秋天最適宜，不會有連日大雨，也沒有酷暑；11、12月在臺中、臺南平原只須夏服與襯衣，山道邊樹下有茶亭、涼棚。

八、鞋子：旅行者最重要的武器是草鞋，堅固又合腳，十分耐用。

九、語言：有志踏查的人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只會簡單的會話、少許單字，在詢問地名與行程時十分不便。北臺灣用廈門方言，南方則用廣東方言，若要進行較複雜的問答，建議用筆談。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書目

#### (一) 志書、遊記

向達校注，《指南正法》（清），《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向達校注，《順風相送》（明），《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池志徵，《全臺遊記》，臺灣文獻叢刊第89種。臺北：臺灣經濟研究室，1960年。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1760-1764年），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吳子光，《臺灣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3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周鍾瑄，《諸羅縣志》（1716），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邱文鸞等，《臺灣旅行記》，臺灣文獻叢刊第21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胡鐵花，《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研究叢刊第71種。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叢書第1種。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年。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3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徐懷祖，《臺灣隨筆》（康熙34年，1695）。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高拱乾，《臺灣府志》（1706），臺灣文獻叢刊第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

蔣師轍，《臺遊日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陳盛韶，《問俗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年再版。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1815），臺灣文獻叢刊第1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年。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年。

## （二）專書

Davidson, J. W.（李讓禮）著，蔡啟恆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

Imbault-Huart, C.著，黎烈文譯，《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臺灣研究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5年。

山崎炳根著，楊南郡譯注，《鹿野忠雄——縱橫臺灣山林的博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社，1998年。

中藺英助著，楊南郡譯注，《鳥居龍藏——縱橫臺灣與東亞的人類學先驅》。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原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

必麒麟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臺北：原民文化，1999年。

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著，林弘宣等譯，《素描福爾摩沙：甘為霖臺灣筆記》（Sketches from Formosa）。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年。

-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譯，《臺灣文化志》上、中、下卷。臺北：臺灣書房，2011年。
- 戎小捷，《探險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 吳永華，《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社，1996年。
- 吳永華，《被遺忘的日籍臺灣植物學者》。臺中，晨星出版社，1997年。
- 吳永華，《臺灣特有植物發現史》。臺中，晨星出版社，2006年。
- 吳永華，《臺灣動物探險》。臺中，晨星出版社，2001年。
- 吳永華，《臺灣森林探險：日治時期西方人來臺採集植物的故事》。臺中，晨星出版社，2003年。
- 吳永華，《臺灣植物探險》。臺中，晨星出版社，1999年。
- 林玫君，《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年。
- 林玫君，《臺灣登山一百年》。臺北：玉山社，2008年。
- 長野義虎、田代安定等著，楊南郡譯，《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臺灣探險實錄》。臺北：玉山社，2005年。
- 唐·赫克、柯特·韓森（Don Heck & Kurt Hanson）編著，平郁、邱紫穎譯，《登山聖經》。臺北：商業周刊出版，1999年。
-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編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1998。
- 馬偕原著，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s）。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
- 郁永河著、陸傳傑注，《裨海紀遊新注》。臺北：大地地理，2001年。
- 郁永河著，許俊雅校譯，《裨海紀遊校釋》。臺北：國立編譯館，2009年。
-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6年。

- 楊南郡譯註，烏居龍藏原著，《探險臺灣——烏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
- 楊南郡譯註，鹿野忠雄著，《山、雲與蕃人——臺灣高山紀行》。臺北：玉山社，2000年。
- 楊南郡譯註，森丑之助原著，《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社，2000年。
- 楊南郡譯著，《臺灣百年曙光——臺灣學術開創時代調查實錄》。臺北：南天書局，2005年。
- 楊南郡譯著，《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臺灣探險踏查實錄》。臺北：玉山社，2002年。
- 楊南郡著，《臺灣百年前的足跡》。臺北：玉山社，1997年二刷。
- 楊南郡譯註，伊能嘉矩原著，《平埔族調查旅行：伊能嘉矩〈臺灣通信〉選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
- 楊南郡譯註，伊能嘉矩著，《臺灣踏查日記》（上）（下）。臺北：遠流出版社，1996年。
- 楊龢之，《遇見三百年前的臺灣：裨海紀遊》。臺北：圓神出版社，2004年。
- 費德廉、羅效德編譯，《看見十九世紀臺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臺北：如果出版社，2006年。
- 藤井恭敬著，《臺灣郵政史》。臺北：臺灣總督府通信局，1918年刊本。
- 劉克襄，《穿越福爾摩沙》。臺北：自立報系出版部，1989年。
- 劉克襄策劃、宋文薰等著，《探險家在臺灣》。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8年。
- 劉克襄譯註，《後山探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東海岸的旅行》。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2年。
- 顏金良，《前進老臺灣：郁永河的採硫傳奇》。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年。

鄭安晞，《臺灣最後祕境——清代關門古道》。臺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

鄭順德譯，《孤拔元帥的小水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年。

鄭順德譯、白尚德（Chantal Zheng）著，《十九世紀歐洲人在臺灣》。臺北：南天書局，1999年。

藤崎濟之助原著，林呈蓉譯，《樺山資紀蘇澳行》。臺北：玉山社，2004年。

## 二、外文書目

George L.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6.

Glen Dudbridge ed.,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臺北：順益博物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1999年。

Joseph Beal Steere, 李壬癸編, *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 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2年。

Millicent Mary McClatchie, *In Varying Scenes and Climes, 1895-1899*.（作者打字原稿，收藏於香港檔案館）

R. Swinhoe, *Notes on the Ethnology of Formosa*, London:Frederick Bell, 1863.8.

Robert Eskilden ed., *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5年。

William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I, London: Trubner & Co., 1889.

William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Brothers, 1913.

Réginald Kann 著、鄭順德譯，《福爾摩莎考察報告*Rapport Sur Formose*》，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

大橋捨三郎，《新高登山》。臺北：自刊，1922年。

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臺灣鐵道案内》。臺北州：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1935年更新版本。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1900年。

多田綱輔，《臺灣鳥類一斑》。東京：東京帝國大學，1899年。

伊能嘉矩、栗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東京：草風館，2000年復刻版。

伊藤旭，《新高阿里山登山案内圖》。嘉義：新高阿里山登山案内社，1931年。

保田與重郎，《風景と歴史》。奈良：天理時報社，1942年。

鹿野忠雄，《山と雲と蕃人——臺灣高山行》。臺北：中央公論社，1941年。

諸田維光，《南瀛遺珠：貳百歲年前之臺灣》。臺北：古槐書院編輯局，1909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新高山登山案内》。年代不詳。

蕃務本署，《南湖大山方面調查事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4年。

臺灣總督府文書課內臺灣山嶽會，《新高登山のしをり》。臺北：編者，1927年。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島地質礦產圖說明書》〈附錄〉。臺北：同編者，1898年。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編纂，《臺灣鐵道案内》。社團法人東亞旅行社臺灣支部發行，1927年。

武澤贊太郎，《臺灣旅行案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8年。

### 三、期刊論文

《臺灣山岳彙報》，第1年1號-第15年第12號（臺灣山岳會，1929-1943年）。



《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69號（殖產局博物館內臺灣植物學會〔後更名為臺灣博物學會〕，1911-1924年）。

山崎直方，〈臺灣探檢餘談〉，《地質學雜誌》，4卷41-43號（東京：日本地質學會，1897年2-4月20日）。

中島竹窩，〈生蕃地探檢記〉，《太陽》，第2卷21-25號（1896年10、11、12月5、20日）。

多田綱輔，〈紅頭嶼探檢記〉，《動物學雜誌》，第9卷105、106號（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7年7、8月15日）。

多田綱輔，〈臺東探檢紀行〉，《動物學雜誌》，第9卷108號（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7年10月15日，頁389-394）。

多田綱輔，〈臺灣採集動物〉，《動物學雜誌》，第10卷121、122號（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8年11月15日）。

多田綱輔，〈臺灣探檢旅行餘錄〉，《動物學雜誌》，10：111（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8年），頁17-18。

多田綱輔，〈臺灣探檢餘錄〉，《動物學雜誌》，第10卷111號（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8年1月15日），頁17-23。

多田綱輔，〈臺灣通信（其一～其五）〉，《動物學雜誌》，96-103（東京市：東京動物學會，1896年10、12月、1897年1-5月）。

多田綱輔，〈臺灣蕃地紀行〉，《動物學雜誌》，第9卷105號（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897年8月15日），頁284-290。

江崎悌三，〈臺灣採集旅行記〉，《動物學雜誌》，第34卷（東京：日本動物學會，1922年2月17日），頁29-41。

吳文星，〈日本據臺前對臺灣之調查與研究〉，《第一屆臺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頁567-576。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黃富三、古偉瀛等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頁11-28。

- 林玫君，〈探險臺灣山岳的起點——清代時期的「望山」和「登山」活動〉，《人文學報》，2（2003年12月），頁189-207。
-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2（2003年），頁1-38。
- 施添福，〈開山與築路：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地理研究報告》，300（1999年5月），頁65-99。
- 伊能嘉矩，〈臺灣に於ける土蕃の研究は如何程まで支那人の手によりて成就せられし乎〉，《東京人類學會》，14：157（1899年4月）。
- 梅陰子（伊能嘉矩），〈回想餘筆（一）〉，《雜誌記事綴帳》，1900年，頁7-10。
- 鳥居龍藏，〈臺灣中央山脈の横断〉，《太陽》，第7卷9-13號（1901年9-11月5日）。
- 鳥居龍藏，〈臺灣生蕃地探検者の最も要す可き智識〉，《太陽》，第3卷15號（1897年7月20日），頁17-187。
- 鹿野忠雄，〈次高山彙の 蝕地形〉，《地質學雜誌》，第41卷489號（東京：日本地質學會，1934年），頁422-423。
- 富田英勇，〈山旅の心得〉，《臺灣鐵道》，1941年3月5日，頁57-62。
- 臺灣協會，〈觀光引路 第二十一 賽會開辦〉，《臺灣協會會報》，1903年3月20日，頁50-52。
- 臺灣教育，〈新刊紹介〉，《臺灣教育》第344號（1931年3月），頁142-144。
- 幣原坦，〈臺灣の黄金、硫黄石炭探検に關する文獻内容〉，《愛書》，1（1933年），頁78-93。
- 齋藤音作，〈モリソン紀行（附生蕃事情）〉，《太陽》，第3卷9、11、14、16號（1897年5-8月5日）。
- 齋藤音作，〈新高山紀行（附生蕃事情）〉，《太陽》，第3卷18、19號（1897年9月5、20日）。

Arthur Corner, *A Tour through Formosa, from South to North*,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XII, (1877), pp.53-63.

Edward.C.Taintor,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June 18, 1874).

John Dodd, "A few ideas on the probably origin of the hill tribes of Formosa",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9(June 1882),pp. 69-77 ; 10(December 1882), pp.195-203.

George Ede, "Journey to north Formosa", *The Prebyterian Messenger*(23 July 1886), pp 5-8 ; (6 August 1886), pp. 6-9.

William Campbell, "Aboriginal Savages of Formosa", *Ocean Highways: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New Series*1,(1874) , pp.411-412.

#### 四、報紙與檔案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雇員石井八万次郎外三名出張ノ件殖産部長上申〉，明治28年（1895），永久保存，第5卷46冊。

Notes for Explorers—The Transmission of Field Survey Experiences  
in Taiwan

Su-bing Chang<sup>\*</sup>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notes for explorers” that “explorers”—Han Chinese, Westerners and Japanese—in Taiwan left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Opening of Treaty Ports and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explore journals, research records, book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researcher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explorers’ preparatory work of their journeys, how the basic information was acquired, and the notes that explorers came with after the expedition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since explorers ca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rrived in Taiwan at different times, they obtained information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were assisted by their own interpersonal networks. The written records created by the explorers conveyed their personal thoughts at different levels. Certain experiences were further organized and presented as notes. These accumulated “thoughts” or “notes” formed a part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exploration. Later generations are then able to gain field survey experiences passed on by these predecessors. As times have changed, the traffic conditions in Taiwan have improved; the mountain areas were also partially opened. “Notes for explorers (travelers)” have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ravel guides.” The nature of field survey has thus changed.

Key words : explore, field survey, Notes for explorers, information network,  
travel guide

---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